

· 特約稿 ·

十八、十九世紀朝鮮燕行使在清朝的交流活動：介紹藤塚鄰博士遺品

金文京*

十八、十九世紀的東亞相當於在西洋文明衝擊之下進入近世末期。而有關清朝、朝鮮文人交流的研究中，藤塚鄰（1879~1948）《清朝文化東傳研究》應該是早期經典之作。該書利用了作者任職京城帝大教授時所收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及文物，直至今日仍不失其研究上的價值。藤塚鄰的藏書不幸於二戰末期罹回祿之災燒失過半，躲難倖存者則於 50 年代歸哈佛燕京圖書館之藏。至於金正喜等朝鮮文人的書畫資料乃於年前遺族藤塚明直先生捐贈韓國秋史博物館。不意筆者 2014 年在偶然的機會購得藤塚先生遺族秘藏的資料。雖為碩果僅存，不乏珍品，其中一些文物《清朝文化東傳研究》中沒有提到，尤為值得介紹。十八、十九世紀東亞文人的交流中，確實存在堪稱文藝共和國的一面。可是，我們也無法否認他們的交流同時隱含著國家觀、民族觀的深刻矛盾。

關鍵詞：朝鮮燕行使、藤塚鄰、文化交流、清朝文獻、東亞文藝共和國

*日本京都大學榮譽教授、鶴見大學文學部中文系教授。

一、前言

十八、十九世紀的東亞相當於在西洋文明衝擊之下進入近代之前的近世末期。此一時期東亞文化交流的特徵是：屬於漢字文化圈的朝鮮、日本、越南等中國近隣諸國，通過千年以上的中國各方面文化的學習，各國的上層知識人對儒學、佛教、文學等的知識以及撰寫漢文漢詩的能力已臻幾乎完美熟嫻，並不亞於同一時期中國第一流文人的水平，以至包括中國的圈內各國知識分子共享同一價值觀及教養，得以廣泛進行個人交流。此為之前文化交流所沒有的現象。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一時期，相對清朝與日本沒有正式外交關係、只有通過長崎的有限交流，朝鮮則與清朝、日本雙方都保持外交關係，既有每年例派北京的燕行使、又有每逢德川將軍襲封之際所派通信使，因此，這些使節擁有機會可與清朝、日本的知識分子進行相對頻繁的交流活動。近年以來、學界對東亞前近代交流史的關心普遍提高，朝鮮燕行使及通信使跟中日文人的交流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而有關清朝、朝鮮文人交流的研究中，藤塚鄰（1879~1948）《清朝文化東傳研究》應該是早期經典之作。¹該書利用了作者任職京城帝大教授時所收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及文物，直至今日仍不失其研究上的價值。藤塚鄰的藏書不幸於二戰末期罹回祿之災燒失過半，躲難倖存者則於 50 年代歸哈佛燕京圖書館之藏。至於金正喜等朝鮮文人的書畫資料乃於年前遺族藤塚明直先生捐贈韓國秋史博物館。不意筆者 2014 年在偶然的機會購得藤塚先生遺族秘藏的資料。雖為碩果僅存，不乏珍品，其中一些文物《清朝文化東傳研究》中沒有提到，尤為值得介紹。

鑑於此，筆者於 2015 年 2 月 22 日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開了遺品展覽會及相關演講會，也刊行了簡單的目錄解題。²本文將介紹其中有關燕行使與清朝文人交流的資料，闡述其背景，聊供相關學者的參考。

二、布衣詩人劉枻贈金命喜的諸日如〈墨竹圖〉畫幅

¹ 藤塚鄰著、藤塚明直編：《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

² 金文京編：《藤塚鄰博士遺品展示會目錄解題・講演會「東アジア近世の書籍文化交流」資料》（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15）。演講者為鄭珉（韓國漢陽大教授）、陳正宏（中國復旦大教授）、藤本幸夫（京大人文研客員教授）。遺品中有關燕行使的捐贈高麗美術館，其他藏在京大人文研所。

《清朝文化東傳研究》中占篇幅最多的人就是金正喜。金正喜在北京與阮元等文人、學者交流，是中朝文化交流史中的核心人物。其弟金命喜（1788~1857，號山泉）於1822年（清·道光2、朝鮮·純祖22）相陪該年當冬至兼謝恩正使的乃父金魯敬（號西堂），以子弟軍官的身份燕行時，北京有一布衣詩人劉栻送他清初畫家諸日如的〈墨竹圖〉且題字。《清朝文化東傳研究》第二〈歸東篇〉第十章二〈西堂·山泉燕行〉提到金命喜在北京交流的清朝文人中有劉柏鄰（柏鄰為劉栻字），卻沒有提及此畫。〈墨竹圖〉的左右兩側有以下題字（原文字體繁簡不一，今均改為正體，且加句讀，下同）。

諸日如先生以中鋒畫竹為國初宗匠。此其真跡也。惜損破，重裝之，猶足滌人心志。癸未春晤山泉於京邸。其言論丰采有大過人者，遂締交。因以贈之，為祝他日凌雲（以上右側）之勢有如此者。日如名升，錢塘人。道光三年正月廿有八日，識於一石山房。柏鄰劉栻。「燕都/劉栻」〈陰刻朱方印〉「老/柏」〈陽刻隸體朱方印〉（以上左側）

劉栻（生卒年不明），張之洞《（光緒）順天府志》卷126〈藝文志五〉云：「劉栻，一石山房詩一卷，存。栻字柏鄰，寶坻人，布衣」；陶樑《國朝畿輔詩傳》（道光十九年紅豆樹館刻本）卷60亦云：「栻字柏鄰，寶坻人，布衣。有一石山房詩一卷」，是布衣詩人，無甚名氣。

金命喜，字性源，號山泉。1810年（純祖10）進士。官弘文館提學，後任江東縣令。他在北京與金石學者劉喜海、吳蘭雪交流，回國後把朝鮮金石拓本贈給劉喜海，襄助其《海東金石苑》的編纂，《清朝文化東傳研究》中有詳細記載。

諸升（或諸昇1617~1690以後），杭州人，字日如，號曦庵（《國朝畫徵錄》）。³《芥子園畫傳》二集〈蘭譜〉、〈竹譜〉的原畫乃出其手筆。⁴只是此〈墨竹圖〉沒有諸升的落款，與傳世真品⁵相比，構圖相似，筆調卻粗糙。劉栻雖云「真跡」，客觀地說不無疑問。可是劉栻把自己珍藏的畫圖特意裱裝，贈給不通語言的異國青年，祝福其前途有成，其誠心摯意應該是由衷的，看不出把朝鮮視為屬國的優越感或中華思想。他說「為祝他日凌雲之勢

³ 張庚：《國朝畫徵錄》（乾隆4年蔣泰刊本）卷上〈魯得之〉云：「繼起者推仁和諸昇、山陰王岵。昇字日如，號曦庵。筆亦勁利，然失之勻矣」。（編按：頁碼不詳。）

⁴ 大東急記念文庫編：《芥子園畫傳》二集（東京，勉誠出版，2009）；沈心友：《畫傳合集例言》云：「王蘊菴（王質）、諸曦菴，武林名宿也。聞畫傳二集之請，兩先生白髮蕭蕭，欣然任事，三年乃成。蘭竹二種俱曦菴所作，蘊菴佐之」。又〈蘭譜〉有諸昇：〈蘭竹譜序〉。小林宏光：〈中國畫譜の集大成—『芥子園畫傳』初集・二集・三集の全貌〉（影印本附錄）也有相關記述。

⁵ 註4小林宏光論文有諸昇：〈竹叢雙禽圖〉（圖十六）。又中國大紀元文化網：
<http://www.ga.epochtimes.com/b5/3/5/5/c12708.htm>，有泰州市博物館藏諸升〈墨竹圖〉畫像。

有如此者」，也許困躓場屋，官途無望，把自己沒能實現的夢寄託給金命喜，心中應無華夷之分。

三、清朝文人贈柳得恭的扇面

柳得恭（1749~1807）是十八世紀朝鮮所謂北學派實學者的代表人物之一。字惠甫，號惠風、冷齋、冷庵、古芸堂。曾師事於以《熱河日記》的著者出名的朴趾源，1774年（英祖50）考上司馬試，1779年（正祖4）與李德懋、朴齊家、徐理修共當王室圖書館奎章閣檢書，當時稱為四檢書。又與朴齊家、李德懋、李書九共稱漢學四家。有《冷齋集》、《古芸堂筆記》等著作。

他的燕行有兩次。首次是1790年（乾隆55、正祖14），以進賀副使徐浩修的從官身份，與朴齊家第一次去北京，回國後著有《熱河紀行詩註（灤陽錄）》。接著1801年（嘉慶6、純祖元）隨行謝恩使再度與朴齊家一起燕行，乃有《燕臺再遊錄》之作。兩次燕行中，他與紀昀、李調元、李鼎元、阮元、羅聘、陳鱣、黃丕烈等當時有名的學者、文人交流，《清朝文化東傳研究》總說第六章〈朴楚亭·柳惠風的入燕和清儒〉有詳細記載。

以下介紹的扇面四件都是再遊時清朝文人所贈。其中①②③則於《燕臺再遊錄》有相關記錄，《清朝文化東傳研究》只提到①而已。

①曹江〈送別詩及隸書扇面〉

詩云：

奇緣萬里種，握手一歡然。疋望中朝著，新詩古驛傳。投情縞紵外，歸路海雲邊。縱復來持節，相逢也隔年。

柳君惠風，予遇之書肆中。一見如故，相與訂交。既半月敘，君又將歸東海。正未知相逢何日，能不悵然。君屢索拙作，自顧不堪呈教。君行有日，情不能已，姑踐昔言。知君他日偶一展玩，或憶及今日之敘云爾。海上玉水曹江未定艸。「玉水」（陽刻朱印）

接著以隸體書云：

皇王施令，寅嚴宗誥。我有絲言，兆民尹好。惠風先生復索八分，不敢方命，

聊博一哂。玉水又書。

此一扇面已見於《清朝文化東傳研究》卷頭圖版 12。曹江（生卒年不明）亦見同書第一〈燕行篇〉第二章〈阮堂之入燕及曹玉水〉、又第二〈歸東篇〉第十一章〈曹玉水·周吉人·陳石士和阮堂〉。他在此時認識了柳得恭，後來也與金正喜、命喜兄弟交流，是此一時期朝鮮、清朝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

下面要補充《清朝文化東傳研究》的相關內容。關於曹江，柳得恭《燕臺再遊錄》辛酉四月十五日有以下記事：

曹江字玉水，江蘇青浦人。書肆中識之。年二十一，美姿容。問其所寓，正陽門外蔣家衚衕雲間會館也。出游琉璃廠，時多歷訪。見其獨處習隸書，日益親，備問家閥。玉水父錫寶，字劍亭。乾隆末，以監察御史劾奏大學士和坤。現贈副都御史。玉水恩給七品廕生。奉母寓居京師。聘戶部尚書朱珪從孫女。曹習蒼仁虎，乃其同宗叔輩。副都御史陸錫熊、王蘭泉昶子肇嘉，皆其姊夫也。姻族多名流，而性沈靜可喜。約游廠中，則不肯曰：「此名利場，易招謗。」其言又是也。臨別贈余扇。題詩云：「奇緣萬里種，握手一歡然。雅望中朝著，新詩古驛傳。投情縞紵外，歸路海雲邊。縱復來持節，相逢也隔年。」又以劉中堂墉一對及其館師唐晟一對見贈。余一日訪玉水，（中略）玉水謂余曰：「每見君呼僕人，似是伊隆納。何也。」余曰：「我見君呼僕，曰來啊。此之類也。」玉水曰：「君何其長也。」余曰：「君何其短也。」與之一笑。（下略）⁶

據此可知，兩人在琉璃廠書肆中偶識，很快就親密起來，以至個子長、個子矮地互為調侃。曹江所問「伊隆納」即朝鮮語的「이리오너라 (irioncra)」，就是「來這裡」之意，正與中文「來啊」相當。由此而看，柳得恭似乎懂一點中文，可是兩人交流應該主要由筆談進行。

曹江之父曹錫寶（1719~92）是 1757 年（乾隆 22）進士、官至陝西道監察御史。他曾彈劾權臣和坤而免職，死後因和坤失權，追贈副都御史，《清朝稿》卷 322 有傳，傳云：「錫寶贈副都御史，其子江視贈官予廕。錫寶，一士從子，再世居臺省，敢言名。家有甕，焚諫草，江嘗乞諸能文者為詩歌，傳一時云。」曹江可謂名門公子。

其五律乃送別異國朋友之情溢於言表，可是應柳得恭之請求所寫的八分書則稍微異於

⁶ 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60 冊（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中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合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卷 25。（編按：頁碼不詳。）

是。所謂「皇王施令」云云，典出《文心雕龍》〈詔策篇〉的〈贊〉，意謂天子有令，兆民欣從。顯然，他意識到對方是屬國朝鮮的使節，有意而發的，所謂「兆民」自是包括朝鮮。柳得恭在《燕臺再遊錄》中寫與曹江的交流情況，可謂巨細畢舉，卻沒有提到此《文心雕龍》之贊，值得懷疑。

柳得恭著作中有《渤海考》，論述渤海國的歷史、地理、制度。⁷其序云：

高麗不修渤海史，知高麗之不振也。昔者高氏居于北曰高句麗，扶餘氏居于西南曰百濟，朴昔金氏居于東南曰新羅，是謂三國，宜其有三國史，而高麗修之是矣。扶餘氏亡，高氏亡，金氏有其南，大氏有其北曰渤海，是謂南北國，宜其有南北國史。而高麗不修之非矣。夫大氏何人也？乃高句麗之人也。其所有之地何地也？乃高句麗之地也。而斥其東，斥其西，斥其北而大之耳。及夫金氏亡，大氏亡，王氏統而有之曰高麗。其南有金氏之地則全。而其北有大氏之地則不全。或入於女真，或入於契丹。當是時，為高麗計者，宜急修渤海史。執而責諸女真曰：何不歸我渤海之地。渤海之地乃高句麗之地也。使一將軍往收之，土門以北可有也。執而責諸契丹曰：何不歸我渤海之地。渤海之地乃高句麗之地也。使一將軍往收之，鴨綠以西可有也。竟不修渤海史，使土門以北鴨綠以西不知為誰氏之地。欲責女真而無其辭，欲責契丹而無其辭。高麗遂為弱國者，未得渤海之地故也。可勝歎哉。⁸

眾所周知，當時的朝鮮知識分子普遍擁有小中華思想，夷視清朝，認為中華文明已遷徙到海東。柳得恭等的北學派，則一反以往蔑視清朝的態度，要積極吸取清朝先進文化。其實，他們的國家觀似乎未能完全擺脫小中華意識的框架。柳得恭竟然把渤海故疆即清朝祖先之地滿洲視為己有，對中國來說當是石破天驚之論。〈渤海考序〉撰於 1784 年（正祖 8），是首次燕行的六年前，可見他早就有此一想法。《燕臺再遊錄》說他把〈渤海考〉的義例送給紀昀，要收在《四庫全書》，⁹他對清朝的看法，則不言而喻了。

再看曹江所以寫《文心雕龍》〈詔策篇〉的理由，他做為漢族書香門第，對滿清的統治自是不無委屈。可是既為清朝的官宦，當以天朝姿態面臨朝鮮使節。因此，兩人只能以文會友，朋友情感歸情感，至於彼此國家觀，則無法相容的。

⁷ 柳得恭：《渤海考》，京都大學圖書館藏朝鮮末期鈔本。（編按：頁碼不詳。）

⁸ 柳得恭：《冷齋集》卷 7〈渤海考序〉、《韓國文集叢刊》260 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0）。（編按：頁碼不詳。）

⁹ 柳得恭：《燕臺再遊錄》四月一五日云：「（曉嵐）謂余曰，如有所著書種，示我以義例。余問何用。答我現充四庫全書校勘之任。天下書如未得全本者，但編入義例。余曰，我非噉名客。既勤苦索，故錄贈渤海考義例。」

柳得恭的同志朋友，兩度燕行均攜行的朴齊家也有〈渤海考序〉，¹⁰所論與柳得恭的主張幾乎相同，可見柳得恭的國家觀在當時朝鮮並不是一己之見。

附帶說明，當時朝鮮知識分子關心渤海問題，可能是日本通信使所帶來的有關信息所觸發的。柳得恭、朴齊家的友人，也有燕行經驗的李德懋在〈渤海通日本〉一文中，引用《續日本紀》，轉述渤海與日本交流的記載。¹¹日本有關渤海的信息主要是 1736 年（日本・寶曆 13、朝鮮・英祖 39）的第十一次通信使節，尤其是回國後撰《和國志》介紹日本情況的書記元重舉所帶來的。李德懋參考《和國志》撰寫的《蜻蛉國志》¹²也提及渤海與日本的交流情況。柳得恭為《蜻蛉國志》及李書九用元重舉帶來的日人漢詩所編《日東詩選》作序¹³、對日本也有一定的知識。可見北學派對清朝和日本的關心是連續的。

①沈剛〈梅花圖題詩扇面〉

冷澹孤高清瘦奇。此花惟有此君知。自從和靖先生後，不着人間一句詩。書澹吟樓句，古芸先生政。唐亭沈剛。「唐亭」（陽刻朱印）

《燕臺再遊錄》四月十五日云：

沈剛號唐亭，江蘇松江人，皇明侍講學士度後孫。曹玉水處識之。玉水每戲之曰：「此公雖孝廉，胸中却無一個字，只善畫梅。」余曰：「孝且廉，何必多識字？」尋得其梅花一幅，果好。題朱子詩句云：「仙人冰雪姿，貞秀絕倫儼。」又於扇面寫梅贈余，題云：「冷澹孤高清瘦奇。此花惟有此君知。自從和靖先生後，不着人間一句詩。」筆蹟亦妙絕。詩稱澹吟樓句，不知誰作。甚佳，或其自號爾。

沈剛（生卒年不明），字心源，號唐亭、唐堂。婁縣（今上海市松江）人，舉人。善畫蘭竹、篆刻。¹⁴

張梁（1683~1756）《澹吟樓詩鈔》卷 8〈題畫梅〉¹⁵、《國朝詩人徵略》卷 21、《湖海詩傳》。

¹⁰ 朴齊家：〈渤海考序〉《貞蕤閣文集》卷一，《韓國文集叢刊》261 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0）。

¹¹ 李德懋：《青莊館全書》卷 54〈盞葉記〉1，《韓國文集叢刊》258 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

¹² 李德懋：《青莊館全書》卷 65〈異國〉《蜻蛉國志》。

¹³ 柳得恭：《冷齋集》卷 7《韓國文集叢刊》260 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0）。（編按：頁碼不詳。）

¹⁴ 葉銘：《廣印人傳》（杭州：西泠印社刊，1910），伏見冲敬編：《印人傳集成》（東京：汲古書院，1976），頁 223。

¹⁵ 張梁：《澹吟樓詩鈔》（影印乾隆二二年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編按：頁碼不詳。）

②章寶蓮〈墨竹扇面〉

畫竹不在多，數竿亦已足。夜半起秋風，蕭蕭戛寒玉。冷齋先生政。 章寶蓮。
「寶蓮」(陰刻朱印)「虎伯」(陽刻朱印)

《燕臺再遊錄》辛酉四月十五日云、「章寶蓮，字虎伯，江南嘉定人。贈余墨竹畫扇。題詩云：畫竹不在多，數竿亦已足。夜半起秋風，蕭蕭戛寒玉。」。

章寶蓮見端方《壬寅銷夏錄》¹⁶，盛大士《蘊愔閣詩集》(道光元年刻本)卷 7 有盛大士、章寶蓮的〈韜光寺聯句〉。

③張道渥〈水墨畫扇面〉

「水屋道人，為冷齋先生作」，「水」「屋」二印(陰刻朱印)。《燕臺再遊錄》沒有有關張道渥的記載。1792 年(乾隆 57、正祖 16) 隨行冬至使的金正中《燕行錄》¹⁷三月十六日：

張道渥，字水屋，號夢覺，太原人。善詩畫，尤工指隸。官至揚州刺史，今為落職在家。

朴齊家《貞蕙閣四集》：「燕京雜絕。贈別任恩叟弟兄、追憶信筆。凡得一百四十首」其三十一：「輶軒聞所聞，風子得官去。傲吏無世情，狂名落何處。張道渥，字水屋。罷官揚州鹽運。自稱風子，聞飄(?)復以知州用。」『韓國文集叢刊』二六一冊。

張道渥、字水屋、封紫，號竹畦、張風子、山西平陽府浮山縣。《晚晴簃詩匯》卷 103 云：「張道渥，字水屋，浮山人，諸生。官霸州知州，有《水屋剩稿》」¹⁸錄詩一首。《清詩紀事》也有相關記事。¹⁹也與翁方綱有交流。²⁰

¹⁶ 端方：《壬寅銷夏錄》：「癸亥夏日，定軒先生出示戒壇先祠圖冊。謹題五律四首，以志景仰。今秋先生復繪此圖，欲棄諸祠，因重書之。時甲子七月二十五日也。嘉定章寶蓮拜簞。」(編按：出版項及頁碼不詳。)

¹⁷ 林基中：《燕行錄全集》第 75 冊(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¹⁸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第 5 冊卷 103(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 4358。又同書卷 102〈法式善〉有〈和張水屋道渥遊西山詩〉，頁 4286。

¹⁹ 錢仲聯：《清詩紀事》(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第 11 冊乾隆朝卷，頁 7711。

²⁰ 翁方綱：〈跋揚忠愍公墨迹卷〉(『復初齋文集』卷三一、續修四庫全書第一四五五冊)云：「浮山張水屋藏此卷，持來蘇齋俾予敬誦而題其後」。(編按：頁碼不詳。)

四、〈金德雲墓碑〉、〈誥命碑〉拓本

藤塚博士遺品中，除以上文人交流資料之外，還有一些反映當時清朝和朝鮮外交關係的有趣資料。

①「金德雲墓碑」拓本

朝鮮國折衝將軍、僉知中樞府事、大清誥贈光祿大夫、加贈太子太保、領侍衛內大臣、愨勤公、金公德雲之墓。朝鮮國淑夫人、大清誥贈一品夫人崔氏附左。

②「誥命碑」拓本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國有爪牙之選，克宣力於旂常。朝頒綸綍之榮，必勤思於水木。用褒先世，以大追崇。爾德雲乃管理上駟院院務、散秩大臣、提督南海子、總理烏鎗兼佐領、加二級常明之曾祖父。樹德務滋，發祥有自。敦詩說禮，克垂樽俎之猷。勇戰敬官，早裕熊羆之略。茲以覃恩，贈爾為光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懋功有賞，榮則邇於所生。慶典欣逢，恩不忘其自出。加茲寵秩，尚克欽承。乾隆二十四年，加贈太子太保、領侍衛內大臣、愨勤公。雍正元年誥命。乾隆二十四年加贈。五十六年改豎。

以上兩種拓本也許是同一石碑的前後兩面，今只有拓本，無法確認。兩碑所云乃為對雍正元年（1723）任管理上駟院院務等官的常明的曾祖父，朝鮮金德雲及其妻崔氏的追贈，以及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加贈。

常明（？~1742）是正黃旗滿洲包衣，姓金。仕於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至御前大臣、內務府總管，深得皇帝信任，死後追贈太子太保。其祖父新達理原為朝鮮人，於天德元年（1627）率子弟投降於後金²¹。柳得恭《灤陽錄》²²轉引〈誥命碑〉云：

工部尚書金簡者，常明之從孫。常明即我義州人，僉中樞德雲曾孫。德雲墓在州南山。

²¹ 參看徐凱，陳昱良：〈清代金氏常明史事考述〉（《韓國學論文集》十五輯，2006）。（編按：頁碼不詳。）

²² 《灤陽錄》（《遼海叢書》）卷2〈圓明園扮戲〉。（編按：出版項、頁碼不詳。）

余聞於灣人，德雲曾為府通引云。金簡厚待我人。灣府刷馬驅人輩，姓金者每伏謁道旁，冀賞賜。近頗厭之。任譯亦倚以為重。然其實平平宰相，謹事和福者也。

金簡（？~1794）是四庫全書的副總裁，也任武英殿聚珍版的負責人。其妹為乾隆帝的淑嘉皇貴妃。是乾隆朝的名宦。²³他念及祖宗是朝鮮人，每次朝鮮使節來北京時為謀種種方便，甚至把武英殿聚珍版木活字私下讓給朝鮮使節。²⁴

關於常明，《朝鮮王朝實錄》中有相關記事頗多。如《景宗實錄》（卷13）3年（1723雍正元年）9月10日云：

都承旨金始煥，仍陳常明本末曰：此乃我國義州人子孫也。其曾祖丁卯被虜，而其母於康熙有阿保之功，故其子孫為康熙所愛恤。常明仍襲世職，方帶烏鎗總管。通官輩皆其部下也。亦為新皇所偏愛新蒙寵擢，昵侍左右。譯舌輩居間往來，渠言身雖在此，心不忘本。本國凡事，極力周旋云。

《英祖實錄》（卷7）1年（雍正3年）9月12日云：

（左議政閔）鎮遠曰：我國事，金常明每盡力周旋，而常明之先墓在於我國地，故聞欲豎碑，而彼國贈以光祿大夫，且得我國折衝將軍之資必欲竝書云。未知渠何由得我國官資也，我國當為之立碑，而亦當依其所願書之。以大清光祿大夫朝鮮國折衝將軍，可乎？上曰：雖甚可笑，當以此書之矣。

《英祖實錄》（卷11）3年（雍正5年）閏3月3日云：

蓋明史記我朝仁祖事，語多構誣，清國方修明史，故前後使行每請改而不許。是行也，清國執政常明者為之周旋，略改字句，仍示謄本，使臣受還而猶未盡改矣。

所謂「其母於康熙有阿保之功」指的是順治、康熙兩帝的保母奉聖夫人朴氏²⁵。朴氏大概

²³ 《國朝耨獻類徵》初編卷九十《清代傳記叢刊》19冊（臺北：明文書局，1986），頁657有傳。參看徐凱：《論金簡》（《韓國學論文集》第10輯，2003）。（編按：頁碼不詳。）

²⁴ 參看陳正宏：〈乾隆庚戌辛亥朝鮮燕貿活字考〉《東亞漢籍版本學初探》（上海：中西書局，2014）。

²⁵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四庫全書本）卷6〈勅諭〉云：「諭禮部：世祖章皇帝乳母朴氏，保育先

是常明之母。清朝皇帝越過朝鮮國王直接對其陪臣追贈官位，史罕其例，也是對朝鮮主權的嚴重威脅。

五、以清帝為朝鮮人的傳說

關於〈金德雲墓碑〉，還有藤塚博士任職京城帝大教授時所採集到的義州邑的資料。其中有題為〈皇后の産兒取換（皇后掉換嬰兒）〉的傳說：

時ノ清帝ハ多クノ女ノ子ヲ持ッテ井乍ラー人ノ男ノ子ヲ持ッテ井ナカッタ為ニ皇后ノ男ノ子ヲ産マレルコトヲ非常ニ待ッテ井ラレタ。然ルニ皇后ハ孕娠シタケレドモ皇后自身ニ於テモ今回モ亦女ヲ産デハ愈々皇帝ヲ失望サセテハナラヌト思ヒ、若モ女ノ子ヲ産ンダ場合ニ如何ニスベキカト種々ト思案ヲシテオラレタ。時恰モ金常明ノ妻モ殆ド時ヲ同ジフシテ孕娠シテ井タノデ、皇后ハ秘カニ金尚明ノ妻ヲ呼ンデ若シ自分ガ女ノ子ヲ産ンデ、金常明ノ妻ガ男ノ子ヲ産ンダ場合、素早く産兒ヲ交換シテ皇帝ノ満足ヲ買ハントシテ密約ハ成立シタ。孕期満チテ愈々御産ガアッタガ、果セルカナ皇后ハ女ノ子、金常明ノ妻ハ男ノ子ヲ産ンダノデ、約束ニ從ヒ素早く産兒ヲ交換シタ。

時清帝有很多女兒，卻沒有兒子，期待皇后生男。當皇后懷孕時，她也很擔心又生女兒，讓皇帝失望，不免焦慮，就想種種方法。於時，金常明妻子也恰好懷孕。皇后就偷偷告訴常明妻說：如果你生男子，我生女兒，就趕快掉換，用以滿足皇帝。於是兩人旦旦信誓。及期果然皇后又生女，常明妻生男，就如約掉換了。

此一傳說，言外之意就是下一任皇帝原來是常明之子，即朝鮮人。而這又令人很容易聯想到在中國膾炙人口的乾隆為海寧陳氏的傳說。是巧合還是中國傳說影響到朝鮮，目前缺乏資料證明。無論如何，同被滿清給征服的漢族和朝鮮人擁有同一傳說，可謂饒有趣味，令人深思。

皇，克昭敬慎。朕躬幼時，殫心調護。……今封為奉聖夫人。」《清實錄》康熙朝卷 67、康熙 16 年 7 月庚子（25 日）同上。參看《清稗類鈔》〈宮闈類〉〈世祖乳母封奉聖夫人〉。（編按：出版項、頁碼不詳。）

六、結語

關於朝鮮燕行使及通信使與中國、日本文人的交流，最近日本、韓國學界鑑於其超越國度的個人關係，有人就提倡把它稱為東亞文藝共和國。²⁶所謂文藝共和國當是借用歐洲學問共和國（*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的概念。²⁷在東亞首次援用此一概念的大概是中村真一郎的《木村蒹葭堂のサロン（木村蒹葭堂的沙龍）》（新潮社 2002）一書。中村把蒹葭堂的文人沙龍以及其與朝鮮通信使的交流叫稱「文學共和國」或「知識共和國」。可是中村對朝鮮通信使在日本的活動有很大的誤解，以為朝鮮通信使在大阪訪問蒹葭堂，跟日本文人聚會交流。這在當時是不可能的事，通信使一行在日本官方嚴控之下，毫無行動自由，與歐洲同一時期的學問共和國文人自由來往的情況大為懸殊。

十八、十九世紀東亞文人的交流中，確實存在堪稱文藝共和國的一面。可是，我們也無法否認他們的交流同時隱含著如本文前面講述的曹江和柳得恭之間的國家觀、民族觀的深刻矛盾。個人之間基於儒教、文學修養的平等友好的交流關係和國家觀的互相矛盾，也呈現在訪問日本的朝鮮通信使和日本文人、學者的筆談記錄中。²⁸

再著，如果擴展視野來看，我們也應該領悟到如同〈金德雲墓碑〉或乾隆帝漢族、朝鮮人傳說所代表的錯綜複雜的國家關係和民族意識的糾纏到處隱伏，且經過近代一直延續到現在。

²⁶ 高橋博巳《東アジアの文藝共和國—通信使・北學派・蒹葭堂》（新典社，2009）、정민: 《18세기 한중지식인의 문예공화국(十八世紀韓中知識人的文藝共和國)》（首爾：文學村，2014）。

²⁷ 參看 Hans Bots・Françoise Waquet 著、池端次郎・田村滋男譯：《學問の共和國》（知泉館，2015）。

²⁸ 參看金文京：〈《萍遇錄》と〈蒹葭堂雅集圖〉—十八世紀末日朝交流の一側面〉（《東方學》124 輯，2012）。（編按：頁碼不詳。）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大東急記念文庫編：《芥子園畫傳》二集，東京，勉誠出版，2009年。

李德懋：《青莊館全書》卷54，《韓國文集叢刊》258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年。

朴齊家：〈渤海考序〉《貞蕤閣文集》卷一，《韓國文集叢刊》261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0年。

林基中：《燕行錄全集》第60冊，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年。

柳得恭：《冷齋集》卷7，《韓國文集叢刊》260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0年。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103，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張梁：《澹吟樓詩鈔》（影印乾隆二二年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二、近人論著

伏見冲敬編：《印人傳集成》，東京：汲古書院，1976年。

金文京：〈《萍遇錄》と《蒹葭堂雅集圖》—十八世紀末日朝交流の一側面〉，《東方學》124輯，2012年。

——：《藤塚鄰博士遺品展示會目錄解題・講演會「東アジア近世の書籍文化交流」資料》，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15年。

徐凱，陳昱良：〈清代金氏常明史事考述〉，《韓國學論文集》十五輯，2006年。

徐凱：《論金簡》，《韓國學論文集》第10輯，2003年。

高橋博巳：《東アジアの文藝共和國—通信使・北學派・蒹葭堂》，東京：新典社，2009年。

陳正宏：〈乾隆庚戌辛亥朝鮮燕貿活字考〉《東亞漢籍版本學初探》，上海：中西書局，2014年。

葉銘：《廣印人傳》，杭州：西泠印社刊，1910年。

錢仲聯：《清詩紀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

藤塚鄰著、藤塚明直編：《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年。

Hans Bots・Françoise Waquet 著、池端次郎・田村滋男譯：《學問の共和國》，東京：知

泉館，2015年。

정민: 《18세기 한중지식인의 문예공화국 (十八世紀韓中知識人的文藝共和國)》, 首爾:文學村, 2014年。

諸昇: 〈竹叢双禽圖〉(圖十六)。又中國大紀元文化網:

<http://www.ga.epochtimes.com/b5/3/5/5/c12708.htm>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Joseon Missions to Imperial China and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y: by the Introduction of Fujitsuka Chikashi's Collections

Kim Moon-kyong^{*}

Abstract

The East Asia entered the period of early modern by against the cultural shock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Professor Fujitsuka Chikashi(1879-1948), who had studied and worked in the Keijō Imperial University, collected plenty of documents and cultural relics, which are all in relation to the East Asia in the early modern time. Unfortunately, most of those collections were burned off during the world war two, and the remaining was mainly preserved in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library by the 50s. I occasionally, in 2014, bought pieces of artifact which had been collected secretly by Fujitsuka's family. In which are all culture valuables and deserve to be introduced. By appreciating at these artifacts, it can be sure that the cultural exchange among literary figures in the East Asia of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y also reflects scenes similar to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in Europe. However, it also cannot be denied that the communication or the exchange implies deep conflict to the literary figures' ideas of nationality.

Keywords: Joseon missions to Imperial China, Fujitsuka Chikashi , cultural exchange, literatures in the 19th century,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in East Asia

^{*} Professor Emeritus, Kyoto University, Japan.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Tsurumi University, Japan.

